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for Website Publicity :
A Comparison and Its Implications

汉英宣介网页： 对比与启示

雷沛华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汉英宣介网页:对比与启示

雷沛华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宣介网页:对比与启示/雷沛华著.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046-6979-7

I. ①汉… II. ①雷 … III. ①网页—英语—翻译—对比研究—汉语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8561 号

选题策划 王晓义

责任编辑 王晓义 孙红霞

封面设计 孙雪骊

责任校对 杨京华

责任印制 张建农

出 版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 行 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电话 010-62103130

传 真 010-62179148

投稿电话 010-62176522

网 址 <http://www.cspbooks.com.cn>

开 本 240mm×170mm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046-6979-7/H·82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黄友义曾指出,“外宣翻译是一种门面工作,其中的错误与缺陷会被放大来看”。“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然而,我国外宣翻译质量问题一直是困扰翻译界,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以来,我国翻译界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进程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以及提升通过翻译与不同文化对话的能力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是译者缺乏受众意识,对汉英修辞差异缺少了解,同时对译文话语的修辞力量关注不够。加强译者受众意识教育,培养修辞对比意识,重视译文话语的象征力量或许是提高外宣翻译质量的有效途径。沛华的著作《汉英宣介网页:对比与启示》的出版无疑是补充、促进翻译与修辞研究的有益尝试,体现了翻译界寻求解决外宣翻译问题突破口的努力。

本书将目光投向外宣翻译中的对外宣介网页研究。通览全书,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貌似粗浅,实则新意频出。作者首先列举中外学者对翻译标准、翻译过程和译者素养等问题的主要论述,从西方修辞视角就翻译研究中的这些基本元素进行了解读,然后概述相关翻译理论和策略,诸如功能对等和形式对应、归化和异化、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功能目的论、纪实翻译和工具翻译等。在综述各家理论的同时,分析其与对外宣介翻译和西方修辞的关联,见解独特,观点新颖,是丰富翻译与修辞研究的大胆尝试。如韦努蒂提出的归化是指译者跨越语言文化差异,将译笔纳入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作者则结合对外宣介翻译按照目标受众和翻译修辞目的重新选择译文话语内容、重构译文表现形式的现实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内容性归化”和“形

式性归化”。

英汉两种语言在描述相同或相似事物时在话语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本书从中外高校、企业、旅游景点等对外宣介网页文本中选择大量真实案例，通过对比，分析各自在修辞上的特点。话语内容上，主要对宣介网页文本的有效性和可信性进行了深入对比；表现形式上，则从清晰性、质朴性和灵活性方面进行对比。在大量第一手资料修辞对比的基础上，本书深入探讨了汉英修辞差异对翻译实践的意义。将古典修辞学中的人品诉诸、情感诉诸、理性诉诸理论应用于对外宣介网页翻译，也是作者的首创。本书部分内容在著文发表时，曾征求过我的意见，就论文中的问题与沛华邮件往来较多，从中可以感受到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好学上进、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本书最后结合作者在地方院校担任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亲身体验和在语料库翻译领域的前期研究成果，提出汉英修辞对比与语料库和电子翻译工具的使用相结合能够促进英语水平不够理想的学生提高翻译能力和译文质量。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翻译教学和研究中较强的问题意识和科学的治学方法。

“每人前进一小步，社会前进一大步。”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外宣翻译研究的繁荣和翻译质量的提高也是这样。愿沛华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步伐越走越坚实。

陈小慰

2015年9月于榕城

前 言

随着我国国际化和信息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入,许多单位如高校、企业、政府机构、旅游景点等都建立了以翻译为主的英文网页,成为对外宣传推介自己形象、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和途径。网页文本的翻译质量如何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也表现出对我国对外宣传现状的担忧,如我国西方修辞界知名学者刘亚猛先生就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表示:我国的对外宣传长期以来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虽然我们早已具备了将信息传播到西方的技术手段,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然而,这些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信息……在多大程度上使西方读者感到可信、在理、有说服力,从而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观念,则值得认真反省探讨(刘亚猛,2004)。他继续表示,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宣传的“产出”相当有限……在西方,一般人感觉不到中国宣传的存在,更不用说感受到它的效果和冲击了(同上)。刘亚猛先生曾经留学美国,在知名高校任教多年。他在取得正式教职之后,响应祖国召唤毅然回国任教。他以自己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亲身经历表示的担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和思考。

我国外宣材料英译中存在的问题造成了外国受众对我国不同程度的误解,影响了对外宣传的力度和效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由于译者的语言功底不足;或者由于有关部门对其英文网页制作的重视力度不够,走形式、做样子。值得欣慰的是,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并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们认真分析探讨我国对外宣传翻译中的问题,积极探索提高翻译质量的有效途径。如董丽颖(2013)提出“翻译亦营销”的理念,强调翻译应以营销为导向,使中国的文化资源对国外消费者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卢小军(2012)在 Werlich 文本语法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适用于企业概况文本英译的平行文本比较模式,描述和分析了中美企业网站概况在文本惯例上呈现的异同,借此探讨英译企业概况文本

所获得的若干启示；熊力游（2011）指出，由于网页的共时性与交互性、明确的目的性和功用性等特点，在翻译成英文时宜采用编译策略；范勇（2009）则从功能主义视角列举了我国高校英文网页中的种种翻译失误。我国一些区域和单位的外宣网页翻译也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如邹建玲（2013）、傅文（2014）分别调查了上海旅游网站、泰山风景区网站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张美芳（2013）以故宫博物院网站中英文材料为语料探讨了其中特定文化词语的英译策略；等等。这些研究都推动了我国外宣翻译质量的改善，对提高我国的对外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该领域的翻译研究还远远不够系统和深入，我国外宣翻译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针对外宣翻译中起宣传推介作用的宣介网页翻译更加缺乏专门的研究。宣介网页翻译中的种种问题与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符。

传统上，翻译研究中有关“修辞”的讨论主要基于修辞即“修辞格”“修辞手法”或“美文”这样一种认识，围绕翻译与修辞的关注点一般在修辞格的处理，也就是在修辞的美学层面上，涉及的文本也大多为文学作品，研究对象比较单一，很少有人将修辞作为认识、解释和指导翻译活动的一种视角进行关注。本书中的修辞（rhetoric），在古典意义上，是运用演讲说服和规劝听众，让他们接受和采取某种行动，是一门“说服艺术”和“良言学”；在当代意义上，它包括言语在内的一切象征和文化活动与人的关系。Rhetoric 还可以是“修辞学”，它是一门研究人们如何运用古典意义上的演讲和当代意义上的话语、象征来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的一门学问（肯尼斯·博克等，1998）。因此，本书中的修辞不再是“修辞格”或“修辞手法”意义上的“修辞”，它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亚里斯多德，1991），“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的一门实践”（刘亚猛，2004）。

我国翻译界知名学者陈小慰（2007，2013）敏锐地发现了翻译与修辞两大学科之间的关联，认为翻译学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转向之后，也应该有“修辞转向”。她将当代修辞理论成功引入翻译研究领域，提出翻译是一个面向西方受众的现代说服行为和修辞活动，把翻译定义为“在特定译语社会文化环境中跨越语言文化边界，有效运用象征手段，影响特定译语受众的对话过程”（Translation is a dialogic process of influencing a particular target audience, under specific target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acros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oundaries, by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symbolic resources)。所谓象征,是指以语言为主,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交流的标记。陈小慰认为,外宣翻译中的译者有必要加强对英汉修辞传统差异的了解和对比,因为不认识不同语言话语建构方式的差异,译语修辞就很难达到受众预期,也就很难在受众身上产生预期效果。本书在陈小慰翻译与修辞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一些翻译研究关键词,如翻译标准、翻译过程和译者素养等,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列举分析,对相关翻译理论进行梳理,找到这些理论与本书主旨的关联。然后,以外宣中的宣介网页文本为主进行汉英修辞对比,在此基础上,主要将古典修辞研究的重要理论运用到翻译实践,认为除了语言资源,当代译者还要善于运用音频、视频、字体字号等非语言手段,在正确分析受众的基础上,一切以受众为中心,对译文在话语内容和表现形式两方面进行“重构”和“再表述”,而不是照搬原文。本书还从翻译教学的角度,提出平行文本修辞对比对译者培养,尤其对翻译能力有限的新手译者的重要性,并以案例形式探讨如何通过翻译工具能力培养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和译文质量。

翻译学界对“平行文本”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语料库翻译学中,平行文本指的是由原文和另一语言中的对应译文构成的语料;平行文本还可以是话题、体裁和功能相同或相近的两种语言的原文,一般用来考察不同的语言如何表达相同的内容。本书用于修辞对比的平行文本包括以上两种,即把我国宣介网页中文本及其英译与英语国家具有相同或相似交际功能的文本进行修辞对比。由于国内英文网页文本常常不能与中文网页同步更新,即英译宣介文本不是目前中文网页文本的对应译文,而与目前英译文本对应的中文原文又难以获取,因此,本书中有时用于对比的只是国内宣介网页的英译文本与英语国家的相应文本。不管我国宣介网页的英译本还是英语国家的相应宣介文本,其目的都是为了宣传推介自己。从功能上讲,它们也构成一类平行文本。通过平行文本对比可以发现译语文本的修辞特点以及与相应英语文本的修辞和差异,找到某类内容在译语中的表达规范,能够帮助译者提高翻译质量,改善对外宣传的效果,也是我国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用外国人听得懂、容易懂的语言和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真正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平行文本对比的结果还可以应用于交流、传播、公关、广告及一切形式的对外宣传介绍翻译领域,为所有这些以象征手段调节、影响外国受众对我国看法和态度的行业提供基础观念、总体思路和基本方法。将平行文

本修辞对比应用于翻译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具有实际意义。

对外宣介网页翻译研究还是我国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有学者提出，国际化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由于存在着文化、意识形态、语言等各方面的差异，中国文化产业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面临巨大挑战。翻译时由于语境的改变，同样的内容、特点和行文格式可能不仅起不到预期的宣传功能，还会造成相反效果。翻译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本书的研究目的是提高我国对外宣介网页翻译的质量，其主要意义在于促进世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是拓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渠道的关键，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真正走出去。对外宣介网页翻译研究的成果还对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如何通过网络宣传推介文化创意产品提供启示，有助于形成我国面向国外市场的文化交易平台体系，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从仅面向国内市场的单一型向面向国外市场的多元型、开放性转变。

目 录

前言

第 1 章 翻译研究关键词回顾及其修辞解读	1
1.1 翻译标准研究回顾及其修辞解读	1
1.2 翻译过程研究回顾及其修辞解读	11
1.3 译者素养研究回顾及其修辞解读	17
第 2 章 相关译论概述	23
2.1 功能对等	23
2.2 归化翻译	26
2.3 交际翻译	30
2.4 目的论	32
2.5 工具翻译	36
第 3 章 汉英宣介网页文本修辞对比	39
3.1 话语内容	40
3.2 表现形式	74
第 4 章 对翻译实践的启示——以高校网页为例	99
4.1 人品诉诸	100
4.2 情感诉诸	102
4.3 理性诉诸	104

第5章 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108
5.1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教学	108
5.2 翻译能力培养——以电子翻译工具为例	117
附录	132
(一) 我国宣介网页英译文本举例	132
(二) 英语国家宣介网页文本举例	141
主要参考文献	143
索引	149
后记	151

第 1 章

翻译研究关键词回顾及其修辞解读

翻译标准、翻译过程和译者素养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元素。无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还是传统译论中关于翻译研究基本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中外翻译学界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本章列举分析中外各个时期不同学派对翻译标准、翻译过程和译者素养问题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尝试从西方修辞视角对这些基本元素进行解读，旨在重新认识和解释翻译的本质。

1.1 翻译标准研究回顾及其修辞解读

1.1.1 国内外翻译标准研究回顾

谭载喜认为，翻译标准的厘定是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跳出单个翻译理论的狭隘范围，采用综合性的翻译学途径，从多个不同层次加以研究，才能得到比较圆满的答案（谭载喜，2000）。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由于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期待也有差异，衡量翻译的准则各有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标准。

我国的翻译史上，不同时期的翻译家和翻译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

发，提出了自己衡量翻译质量的原则。三国时期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他的《法句经序》中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意思是按照原文的意思，不加文字修饰，被认为是最早的直译说。东晋前秦高僧释道安在《鞞婆沙序》中更加明确地主张译经时要“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林煌天，1997）由此可以看出道安仍然坚持直译，认为翻译过程中要按照原文的本意逐字逐句地翻译，不得对原文的字有所增减，需要时只改动句式即可。道安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意思是说，佛经翻译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比道安稍晚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则主张“意译”，提倡“依实出华”和“曲从方言”。他的译文不拘原文体制，变通达顺，但并非没有节制，依然“务在达旨”。唐代高僧玄奘的翻译指导原则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求真”即追求准确，力求要“忠实原作”；“喻俗”意即使读者理解，就是说要“通顺”。玄奘衡量佛经翻译的标准将直译和意译结合起来，要求翻译既要忠实于原作，又要语言通顺，是翻译标准问题研究的一大进步。

清末马建忠 1894 年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善译”说：“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栴句比，以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转引自陈福康，2000）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标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意即使译文和原文一模一样，没有分厘丝毫的差别，读者也能从中得到与读原文相同的收获。

清末另一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对我国 100 多年来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复于 1898 年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故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转引自陈福康，2000）意思是说翻译工作中有三项不容易做到的事，要忠实于原著即准确，译笔流畅明白，文字典雅。做到忠实于

原著本来就很不容易，而如果只注意准确却忽略了译笔的通达晓畅，那么即便是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可见译笔的流畅是应予以重视的。在语言形式上，他主张以“归化”的方法来表达译者与“他者”的立场。严复将“信”置于三难首位，足见其对翻译“求信”的看重。虽然译界学者对三字标准中的“雅”一直存有异议，但不少专家学者给它赋予了新的解释：有的说译文要有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要“美”；有的说译文要具有“与原文相适应的文采”……所以，时至今日，仍有许多译者赞成“信、达、雅”三字标准（孙致礼，2003）。其实，至今仍赞同这一标准的不止专家学者，我国学界对此几乎人人皆知，被认为是对我国译坛影响最大的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这一翻译标准只能较有效地适应又达又雅的原文，所以不能视为翻译的通用原则。如原文不够通顺、优美，这个原则往往造成信与达、雅之间的矛盾。严复自己就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原文的不达、不雅，是作者出于某种需要有意为之，译文自然也需要如实表达。有时用于汉译外的原文，由于原作者水平不高或匆忙之中粗心大意，有些地方文句欠通、词不达意、文体不符，逻辑不严谨、甚至发生事实性差错。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译者为了实现翻译的目的，只好对原文不完全忠实。信、达、雅翻译标准提出后，补偏救弊的议论很多，总的方向是译文要更好地向原文靠拢。对这一标准的修正和补充并不能摆脱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因为实际翻译的成功不单纯是忠实于原文，还要考虑原文质量、性质；读者的接受情况，如历史、文化、价值观等的差异；原文作者和翻译发起者的实际意图等因素。因此，需有一涵盖面较广、比较宽松、灵活，能真正指导翻译实践的标准。

著名翻译家刘重德对比分析了《天演论》原文和严复的译文，发现严的三段译文均没有按照“信、达、雅”的标准运作，说明此标准具有不可操作性。他汲取严复翻译标准中的合理成分，结合自己长期的翻译实践和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个科学的、可操作的翻译标准：“信、达、切”。“信”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to be faithful to the content of the original）；“达”指与原文一样通顺，具备原文一样的表现力（to be as expressive as the original）；“切”指尽可能切近原文风格（to be as close to the original style as possible）。刘重德（1979）的翻译标准不同于严复之处，主要在于“切”字上。他不用“雅”而用“切”，这是因为“雅”乃“文雅”“尔雅”之意，它只不过是风格中的一种。

他说：“和‘雅’正相对立的，就是所谓‘粗犷’或‘豪放’。‘粗犷’和‘豪放’，显而易见，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因此，翻译起来，不能一律要‘雅’，应该实事求是，斟酌处理，恰如其分，切合原文风格。‘切’是个中性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风格。”刘重德向影响中国一个多世纪的三字标准大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雅”不符合翻译实际，应该用“切”来代替，是对翻译标准的辩证发展。他的翻译观点尽管针对文学翻译展开，但对其他文体翻译也有重要指导作用。

林语堂于1933年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翻译标准之三方面”，其中有“美的标准”。在中国翻译史上，林语堂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翻译的美学思想。他从翻译的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心理和审美效果、审美情趣等方面，提出了他的“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观（方梦之，2011）。在《论翻译》中，他对翻译标准是这样说的：“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林语堂关于翻译的三重标准，和严复的三字标准大致相当。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而翻译与艺术文（诗文戏曲）的关系却不是“雅”字所能概括的。林语堂的美译主要针对艺术文而言。他说：“译艺术文最重要的，就是应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不但须注意其说的什么，而且须注意怎么说法……一作家有一作家之风度文体，此风度文体乃其文之所以为贵……凡译艺术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格调预先认明，于译时复极力模仿，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转引自罗新璋，1984）林语堂的美译显然比严复的“雅”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忠实”“通顺”和“美”的各个层面，林语堂认为它们分别涉及“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以及“译者对艺术的责任”问题，并作了进一步分析。在“忠实”方面，林语堂反对“字字对译”和“胡译”，提倡“忠实须求传神”；在“通顺”方面，他认为，“通顺”与译语读者的接受息息相关，译者应“忠实”于译语文化的阅读习惯，应以译语的“行文心理”为标准；在“美”方面，应该“风格与内容并重”。林语堂的“忠实”标准告诉人们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相对的“忠实”，而无绝对的“忠实”，这从思想上把译者从“绝对忠实”的思想误区中解放出来，为我们评价译文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通顺”标准告诉人们，翻译要以句子为单位，按照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和行文习惯采取意译和完全归化的翻译策略，这忽

略了翻译过程中适当采用直译和异化法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是林语堂翻译标准中不合理的一面；而他“美”的标准，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即翻译文本为文学文本，也就是他说的“艺术文”，这显然不适用于注重信息传递的实用类语篇。

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翻译的标准问题，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鲁迅提出翻译时要“宁信而不顺”，坚持直译甚至硬译，尽量使译作贴近原文，目的是既要“输入新的内容”，也要“输入新的表现法”。所谓“输入新的表现法”就是引进西方的词汇和句法，以丰富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他认为，翻译时不仅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表达方式，还要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从而给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营养。鲁迅指出：“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转引自方梦之，2011）在论战中，鲁迅承认“不顺”并非翻译的理想状态，也再三承认“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正如他自己所说：“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好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同上）。梁实秋主张“宁顺而不信”，认为翻译应为读者考虑，“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顺”的翻译不仅导致了“知识”的虚伪，而且是文化、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表现，因为它迎合本土最易被接受的思维定势（孙歌，2001）。鲁迅以“信”为本的“硬译”不仅比较忠实地保存了原作的风貌，而且能够帮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显示了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并借外力来调整本土文化的内部结构，从而完成“文化重构”事业。鲁迅还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作的风姿。”（转引自陈福康，2000）其中，“原作的风姿”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简单解释为：“原作怎么样，译作也怎么样。”可见，鲁迅并不是不顾通顺，只强调忠实，而是主张忠实和通顺之间的平衡和适度，既要通顺，使读者易懂，又要忠实于原文。鲁迅又继续说道：“为比较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服，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在这精辟而又形象的描述中，“改换衣服”指的是改换语言形式，“不削鼻剜眼”指的是尽力保留原作的洋气、洋风、洋

味等异国情调。“改换衣服”和“不削鼻剃眼”表面上看似乎互相矛盾，但如何恰如其分的解决这对矛盾，正是翻译艺术的关键，也是翻译的难处所在。总之，无论“信而不顺”还是“顺而不信”，都反映了译者在迥异的语言体系之间的一种妥协，是翻译活动复杂性的真实体现。

“神似”与“形似”是翻译标准问题研究的又一对二元对立的观念。神似最早由茅盾于1921年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提出，并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一文中进行了阐述。后来我国不少学者都著文论述过“神似”。“神似”是与“形似”相对而言的，原来是我国古代对诗、画的评语，指在形似的基础上，诗画表现出人、物的神态、气韵达到惟妙惟肖的传神境地。后来，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诗、画的范围。在翻译上，神似是指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必要时摆脱词汇、语法、惯用法等语言形式上的束缚，用地道的译入语传达出原文的艺术意境。傅雷是着力提倡并实践神似论者。1951年他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写道：“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转引自方梦之，2011）20年代，傅雷再次宣言式地表明态度：“禹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之和谐；至节奏于 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转引自罗新璋，1984）傅雷又继续阐述他对神似的看法：“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样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而即使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同上）由此可见，傅雷对神似主张的原因和中外文字的分析非常中肯。他在翻译上所表达的境界，使“信、达、雅”和“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看来过于简单。在文学翻译上，“神似”包括对原著思想美学价值、原著作者真挚情感及其具有艺术意境的语言美的再现。与此对应，文学翻译中的“形似”概念是指译著与原著语言的对应关系。它由五个方面组成，即词素，词汇，语义，句法和传统意义上的修辞。文学作品的神韵总是隐藏在它的语言形式的背后，是抽象无形的；而语言形式又反过来表现作品的神韵，是作品内涵在形式上的体现。因此，文学作品的形和神是